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古代丝绸 设计素材图系

ORNAMENTAL PATTERNS FROM
ANCIENT CHINESE TEXTILES
HAN TO TANG DYNASTIES

汉唐卷

赵丰◎总主编 王乐◎编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丝绸文物分析与设计素材再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 (2013BAH58F00)

中国古代丝绸 设计素材图系

ORNAMENTAL PATTERNS FROM
ANCIENT CHINESE TEXTILES
HAN TO TANG DYNASTIES

汉唐卷

赵丰◎总主编 王乐◎编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 汉唐卷/王乐编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308-17763-4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古丝绸—丝织工艺—中国—汉代—唐代—图集 IV. ①K876.9-64②TS145.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2813号

本作品中文物图片版权归各收藏单位所有, 复原图片版权归作者所有。

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汉唐卷

王 乐 编著

策 划 包灵灵 张 琛

责任编辑 仲亚萍

责任校对 陈思佳

封面设计 赵 帆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16千

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763-4

定 价 18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总序

赵丰

丝绸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自起源之日起，丝绸就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一方面，她是一项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先人们栽桑养蚕，并让蚕吐丝结茧，巧布经纬将其织成锦绮，还用印花刺绣让虚幻仙境和真实自然在织物上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就有着无数项创造发明的专利，其中最为巧妙和重要的就是在提花机上装载了专门的花本控制织物图案，这直接启蒙了早期电报和计算机的编程设计。同时，丝绸印染也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重大发明，汉代的雕版印花技术是最早的彩色套印技术，对印刷术的发明有直接的启发；而唐代的夹缬印染技术也是世界印染史上的一大创造发明，一直沿用至今。另一方面，丝绸更是一门艺术，一门与时尚密不可分的艺术。衣食住行衣为首，蚕丝纤维极好的服用性能和染色性能，使其色彩远较其他设计类型如青铜、瓷品等更为丰富。所以，丝绸能直接代表服用者的地位和特点，能直接代表人们对时尚和艺术的喜好；丝绸的艺术为东西方所推崇，成为古代中国最为重要、最受推崇的艺术设计门类。

与其他门类的文物相比，丝绸在中国历代均有丰富的遗存。最早的丝绸出土于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在商周早期的各种遗存中也可以找到不少丝绸的实物。而完好精美的丝绸织绣服装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开始大量出现，如湖北的江陵马山楚墓、江西的李家坳东周墓。汉唐间的丝绸出土更是数量巨大、保存精好，特别是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汉唐间的丝绸更为重要，其中包括了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丝绸珍品，丝绸图案中也体现了两种艺术源流的交融和发展。宋、元、明、清各代，除相当大数量的出土实物外，丝绸还有大量的传世实物。这些实物一部分保存在博物馆中，特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一类的皇家建筑之中；另一部分保存在布达拉宫等宗教建筑之中。这些丝绸文物连同更为大量的民间织绣，是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在丰富的实物遗存中，丝绸为我们留下了极好的设计素材，成为我们传承和创新的源泉。因此，由浙江凯喜雅集团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牵头，联合浙江大学、东华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科技学院等高等院校，根据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的要求，我们申报了“中国丝绸文物分析与设计素材再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2013BAH58F00），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其主要目的是加强高新技术与织造、印染、刺绣等中国传统工艺的有机结合，研究建立文化艺术品知识数据库，促进传统文化产业的优化与升级，在传承民族传统工艺特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让古老的丝绸焕发新的生命力。

我们的项目从2013年开始，到2015年年底恰好三年，已基本完成。项目包括三个课题：一是丝绸文物信息提取与设计素材再造方法研究，二是丝绸文物专家系统研发，三是丝绸文物创新设计技术研究与技术示范。其中第一部分是中国丝绸文物的基本素材的收集与整理，这一课题的负责人是周旻，参与机构有中国丝绸博物馆、东华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科技学院，其中设计素材部分的主要参加人员有：王乐、徐铮、汪芳、赵帆、袁宣萍、苏淼、俞晓群、茅惠伟、顾春华、蒋玉秋、孙佩彦等。我们按照收集的材料，把所有的设计素材整理分成十个部分出版。

这里，我们要感谢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提出这一文化科技创新项目的设计，感谢浙江省科技厅对我们申报这一项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项目中三大课题组成员的相互配合，特别是感谢第一课题组各成员单位齐心合作，收集整理了数千件中国古代丝绸文物的设计素材。最后，我们也衷心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对中国丝绸博物馆和中国丝绸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贯支持，使得这一图系顺利出版。我们期待，这一图系能为祖国丝绸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从古典到新样——汉唐之间的中国丝绸纹样

王 乐

丝绸是中国历史文明、文化、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起自长安，途经河西走廊，穿过塔里木盆地，直达地中海沿岸，而养蚕和丝织技艺也沿着丝绸之路由中原传入西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丝绸作为工艺美术重要的门类之一，它的图案不仅反映了同时期文化和艺术的风貌，还与织造技术、刺绣技法和印染工艺密切相关。汉唐之间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丝绸图案的主题、艺术风格在吸收、融合外来艺术和文化的基础上对艺术风格进行了自律变更。

对汉唐之间丝绸图案和设计的研究将还原中国蚕桑丝绸传往西方的过程，同时也能让我们了解东西方艺术和文化对丝绸图案的影响，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纺织服饰美术史等各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依据和材料。此外，传统丝绸艺术已成当代设计的重要源泉，对汉唐之间丝绸纹样的整理和复原在传统纺织技艺与现代染织技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对今天的染织图案设计也有借鉴意义。

一、丝绸文物的来源

汉唐之间的丝绸多来自考古发掘，国内的出土地点除了长沙马王堆和江陵凤凰山汉墓外，其他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外的出土地点主要包括俄罗斯的巴泽雷克冢墓和莫谢瓦亚·巴尔卡墓葬群、蒙古的诺因乌拉墓地、埃及的安底诺遗址以及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古城等地。下面介绍一些丝织品出土比较集中的墓葬。



（一）马王堆

马王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为第一代轪侯、长沙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地。一号墓保存最完整，死者为轪侯的妻子。三号墓的主人是轪侯的儿子，下葬年代是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

一号墓锦饰内棺内的尸体脸部覆盖两件丝织物覆面，双手握绢面绣花香囊，两足着青丝履。贴身着“信期绣”罗绮丝绵袍，外为细麻布单衣。两臂肱部缚以绛色丝带，大腿之间的空隙处用绢面裹丝绵塞实。贴身衣外面包裹各式衣着，衾被及丝麻织物共计18层，连同贴身衣物2件，共20层。其上再覆盖印花敷彩黄纱绵袍1件、长寿绣绛红绵袍1件。^[1]棺外有铺饰在棺板上的绣锦和菱形花贴羽锦，以及头端夹缝中的丝织品残片。1号墓东边厢出土3个香囊、1双鞋，还有绣袋、绢袋或麻布袋、彩绘帛画以及木俑的衣饰等。西边厢的6个竹筥内保存有完整的纺织品和衣物，包括绵袍11件、单衣3件、单裙2件、袜2双、袍缘1件以及单幅丝织品46卷等。北边厢的四壁还挂有丝织的帷幔，中部和西部计有夹袍、绣枕、几巾、香囊、枕巾、鞋以及包裹在漆衾外面的2件夹袄和置于衾内的手套、镜衣、针衣、组带等。^[2]二号墓和三号墓中也出土了不少纺织品，种类与一号墓相仿，保存状况则不如一号墓。

（二）武威磨嘴子

甘肃省武威县即汉代武威郡，是当时姑臧县治故地，位居河西走廊咽喉。磨嘴子在武威县城南15公里祁连山下杂木河的西岸，汉墓群从河岸直至台地最高处，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约600米。

甘肃省博物馆1959年清理了31座土洞墓，发掘出土的随葬物品共计610件。丝织品除了用于制作随葬衣物和铭旌外，还有1件保存完好、制作精美的锦缘绢绣草编盒。^[3]1972年清理发掘了汉墓35座，其中48、62、49号墓分属西汉末、王莽、东汉中期三个不同时期，出土了绢、纱、罗、绉、起毛锦等8类15种织物，是研究汉代纺织、印染历史的重要材料。^[4]2003年，中日两国考古工作者对磨嘴子汉墓群进行了联合考古发掘，

[1] 何介均. 马王堆汉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26-27.

[2]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所, 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1-2.

[3]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所, 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1-2.

[4] 甘肃省博物馆. 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 文物, 1972 (12): 9-23, 79-80.

共发掘东汉墓葬 25 座,其中编号为 2003WMM25 的墓中出土了发带、覆面等丝织品。^[1]

(三) 扎滚鲁克

扎滚鲁克村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且末县托格拉克勒克乡西南 3 公里处,是戈壁上的一处绿洲。绿洲及其边缘区域内分布着大小不同的五处古墓葬群,其中最大的一处称为一号墓地。1985—1998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和且末县文物管理所在此进行了三次发掘,共发掘出 167 座墓葬。^[2]

扎滚鲁克一号墓地的考古学文化共分三期,其中第一期的年代在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第二期的年代为前 8 世纪—前 2 世纪,是扎滚鲁克的主体文化,而第三期文化的年代为东汉至晋,即 3—6 世纪。扎滚鲁克共有 30 座属于第三期文化的墓葬,墓中出土大量纺织品,从原料上可以分为丝织物、棉织物、毛织物和麻制品等四类。丝织物数量最多,品种包括织锦、绢、绮及刺绣品等。除了覆面、枕、袋、扎包、扎头带等,更多的是织物残片。织锦主要分为经锦和纬锦两大类。经锦为平纹经锦,丝线不加捻,图案包括“(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纹、水草立鸟纹、菱格纹、花树纹、忍冬纹和曲波纹等。平纹纬锦的丝线通常加有强捻,出土时多为制品,如枕头、扎头带和衣饰绦等,图案主要包括植物纹、狩猎纹和龙纹等。扎滚鲁克出土的刺绣不多,但很精美。在绢和绮地上用锁针绣出图案,以鸟纹和植物纹为主,色彩鲜艳。^[3]

(四) 楼兰

楼兰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东北部,罗布泊西北岸,孔雀河下游三角洲的南部。由于罗布泊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曾经繁盛一时的楼兰国于 4 世纪左右逐渐消亡,掩埋在茫茫沙漠之中。1900 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去西藏的途中来到罗布泊,发现楼兰古国,此后掀起了一股楼兰探险考察热。^[4]1906 年和 1914 年,英国人斯坦因两次来到楼兰,他除对楼兰古国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外,还发现了许多新的遗址和墓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M25)发掘简报,文物,2005(11):32-38.

[2] 新疆博物馆,巴州文管所,且末县文管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新疆文物,1998(4):1-5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1998 年扎滚鲁克第三期文化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3(1):1-19.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1998 年扎滚鲁克第三期文化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3(1):1-19.

[4] 赫定,我的探险生涯,孙仲宽,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270-281.



地,他将这些遗址逐个编了号。发掘品除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还有石器、陶片、青铜制品,以及汉文和佉卢文木简与文书。1914年斯坦因在编号为L. C.的墓葬群中发掘了大量的丝织物和毛织物等物品。丝织物品种丰富,有锦、汉式绮、绢、刺绣等,其中有大量织有铭文的动物云气纹汉锦,铭文包括“韩仁绣文衣右子孙无极”“长乐明光”“登高明望西海”“延年益寿”等。^[1]斯坦因将该墓葬的年代定为前2世纪末至3世纪后期。

1979年至1980年,新疆考古研究所楼兰考古队三次深入罗布泊,对楼兰古城址及附近墓葬群进行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发掘纺织品58件,其中丝织品8件,多为残片,包括1件波纹锦,绛色地显绿色波纹。^[2]1980年,考古工作队小分队在楼兰城郊发掘两处古墓群,对MB墓地2号墓(斯坦因编号L. C. iii)进行了重新清理,发掘了大量精美的纺织品,其中丝织物75件,品种包括锦、绮、绢和刺绣。^[3]2003年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L. E.城东北约4公里处的壁画墓进行考古清理挖掘。该墓被认为是魏晋时期L. E.城一个贵族家族的合葬墓,年代约为3—4世纪。墓中清理出大量的织物残片,这些织物残片大多为破损的衣物,经清理拼对,能辨认的服饰包括袍、衫类上衣5件,裙1件,刺绣手套1只,贴金衣饰1件,棉袜3只。此外还有几何纹锦1件,几何纹绮1件,三角形刺绣1件,以及棉、毛织物残片若干。^[4]

(五) 尼雅

尼雅遗址位于新疆民丰县境北约100余公里处,是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一处典型的内陆沙漠绿洲型聚落遗址,也是《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精绝国故地。1901年斯坦因首先发现了该遗址,之后,他又分别于1906年和1913年重返尼雅进行发掘,收获了少量的纺织品残片。

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文物普查时进入民丰县以北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尼雅遗址发现了一座男女合葬墓。箱形木棺上面覆盖一层毛毯,棺内尸体面部盖覆面,头下枕锦枕。身上的服饰及随葬丝织品保存完好,包括:“万世如意”男锦袍、刺绣男裤、淡青色女上衣、刺绣女内衣、刺绣女裙、刺绣镜袋、刺绣云纹粉袋和

[1] Stein, Aurel. *Innermost Asia: Vol.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XXXIV.

[2] 新疆楼兰考古队. 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 文物, 1988(7): 1-22.

[3] 新疆楼兰考古队. 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 文物, 1988(7): 23-39.

[4] 阿不都热苏勒, 李文瑛. 楼兰LE附近被盗墓及其染织服饰的调查 // 大漠联珠: 塔克拉玛干丝绸之路服饰文化考察报告.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7: 59-73.

袜带、菱纹“阳”字锦袜以及用“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制作的袜、手套和鸡鸣枕等。1988年和1990—1997年间，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联合考察队对尼雅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和发掘，1995年发掘的一号墓地3号墓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为丰富，包括“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衾、“世母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枕、茱萸纹锦面衣、人物禽兽纹锦袍以及锦手套、锦栲袋、锦镜袋、香囊、帛鱼等。^[1]8号墓的东侧紧临3号墓，出土丝织物包括“安乐如意长寿无极”锦枕、“千秋万岁宜子孙”锦枕、用“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和“安乐绣文大宜子孙”锦缝制的锦袍、“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等。^[2]

（六）山普拉

山普拉墓地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拉乡西南14公里的戈壁滩上，早年遭到盗掘破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和田地区文物管理所曾于20世纪末进行了四次清理发掘，出土文物千余件。墓葬的年代在1世纪至4世纪末间，^[3]其出土丝织物反映了汉晋时期古于阗国的服饰文明。丝织物服饰主要包括套头衣、裤、帽、护颌罩和头带等。套头衣多为成人服装，小孩的比较少，面料以毛织物为多，仅发现1件绢夹衣残片和花草纹刺绣绢衣残片。墓葬中除了5件毛布覆面和1件棉布覆面，还发掘出19件丝质护颌罩，罩面由绢、绮、锦等缝制，有的上面绣有花纹。^[4]

（七）营盘

营盘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约150公里处，东距楼兰古城约200公里，是迄今为止罗布泊地区发掘的面积最大、资料最为丰富的一处墓葬。营盘出土的纺织品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图案上来看，均反映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特别具有研究价值。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人科兹洛夫、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贝格曼、英国人斯坦因曾先后考察过营盘遗址，发掘过一些文物，但丝织品很少。1989年、1995年和1999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三次对营盘墓地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共发掘约120余座

[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雅95一号墓地3号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9（2）：1-26。

[2] 赵丰，于志勇，沙漠王子遗宝：丝绸之路尼雅遗址出土文物，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2000：25。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46。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36-40。



墓，清理被盗墓百余座。营盘墓葬出土了大量纺织品，有丝、毛、棉、麻四类，前两类最多，占出土文物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1]保存完好的纺织品包括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淡黄色绢内袍、刺绣长裤、贴金毡袜、香囊、帛鱼、刺绣护膊、冥衣和兽面纹锦等。

（八）都兰

都兰县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东南部。自1982年以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了数十座吐蕃墓葬，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遗址。据统计，这批丝绸中，共有残片350余件，图案不重复的品种达130种。其中112种为中原汉地织造，占品种总数的86%；18种为西方中亚、西亚所织造，占品种总数的14%。西方织锦中有独具浓厚异域风格的粟特锦，如红地瓣窠含绶鸟锦、黄地瓣窠对马纹锦等；一件织有中古波斯人使用的钵罗婆文字的文字锦，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唯一一件确认无疑的8世纪波斯文字锦。^[2]

都兰出土的锦绫织物大体上可分为四期：第一期是北朝晚期，时间约为6世纪中叶；第二期是隋代前后，约在6世纪末到7世纪初；第三期为初唐时期，约为7世纪初到7世纪中叶；第四期为盛唐时期，时间约在7世纪末到开元、天宝时期。^[3]

（九）敦煌

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开凿于前秦二年（366年），既是敦煌历史和文化的象征，也是敦煌文物的主要收藏地。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箴意外发现被后人称为“藏经洞”的莫高窟第17窟。洞中除发现大量纸质文书外，还有不少丝织品，包括幡、伞盖、经帙、经袱、佛像以及各种残片，年代约为北朝至五代。

20世纪初，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以及日本的大谷探险队等纷纷来到敦煌，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藏经洞内发现的大量丝织品，致使大批珍贵文物流散海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开始对莫高窟的丝织品进行清理发掘。1965年3月，为了配合莫高窟南区危崖的加固工程，敦煌文物研究所对第125和126窟

[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因半古墓调查，文物，1994（10）：19-31。

[2] 赵丰，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2002：73。

[3] 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63-81。

前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一幅北魏刺绣品的几块残片。^[1]1965年10月,在第130窟内南壁西端一岩孔内发现残幡等织物一捆,经整理共40件,多为绢幡和绮幡,时代为唐代。同年秋,在第122和123窟前发掘时,发现一批唐代遗物,其中丝织物12件且绝大部分都是幡残件。^[2]

(十) 吐鲁番

吐鲁番位于新疆东部,汉代属姑师国的领地,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东南40公里处的戈壁上,是西晋至唐代高昌居民的公共墓地。墓葬年代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晋至十六国时期(3至5世纪末),第二期为麴氏高昌时期(6至7世纪中),第三期为唐西州时期(7世纪中至8世纪)。其中大部分墓葬属于后两个时期,即6至8世纪。

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先后三次来到吐鲁番一带进行调查,在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盗掘,发现了包括绢画《树下美人图》和织有“花树对鹿”铭文的联珠纹纬锦等丝织物。1915年1月斯坦因来到阿斯塔那,对十块墓地进行了挖掘,发现大批服饰碎片和绢画残片。^[3]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阿斯塔那古墓群的清理发掘始于1959年,直至1975年共开展了十三次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400多座,之后又进行了数次小规模清理。墓葬中发现大量丝织品,主要有胡王锦、大鹿纹锦、猪头纹锦、对羊纹锦、翼马纹锦、立鸟纹锦、宝花纹锦、树叶纹锦、联珠对龙纹绮、狩猎纹染纈绢和鱼子纹纈绢等。丝织物品种丰富,包括绢、绮、绫、纱、罗、锦、縠丝、染纈和刺绣等。206号墓还出土了一批唐代木俑,其中宦官俑和舞女俑身着由丝织品制作的服装。^[4]

[1] 敦煌文物研究所,新发现的北魏刺绣.文物,1972(2):54-60,73-74.

[2] 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它.文物,1972(12):55-62,71,63-67,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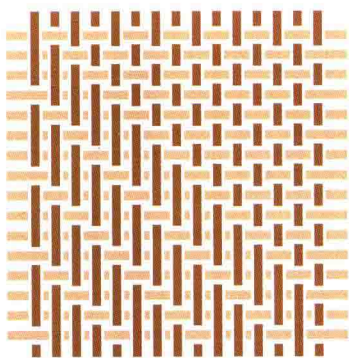
[3] Stein, Aurel. *Innermost Asia: Vol 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642-718.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6):13-21;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3/4):1-3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1(1):8-2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363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2):7-1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第十次发掘简报(1972—1973年).新疆文物,2000(3/4):84-12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第十一次发掘简报(1973年).新疆文物,2000(3/4):168-19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7):8-26;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6):1-14;吐鲁番地区文管所.1986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92(2):143-156;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西区200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4(7):3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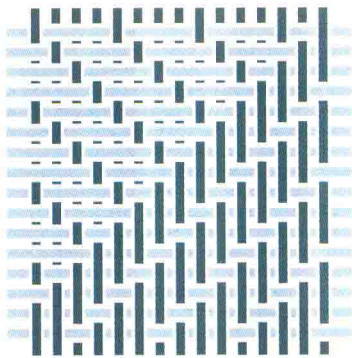
二、显花丝织物的品种

汉唐间的显花丝织物主要包括单色暗花织物、多彩织物、刺绣和印染，其中暗花织物主要包括绮、绫、纱、罗等，多彩织物主要包括锦和缣丝。

平纹地和斜纹地的暗花丝织物在汉唐之间非常流行，在当时，它们都被称作绫。不过在现代考古学中往往把平纹地斜纹花的织物称为绮（图 01），而把斜纹地斜纹花的织物称为绫（图 02）。绮出现在商代，流行于汉唐之间，其主要组织有商周时期多见的浮纹绮、汉代典型的汉式绮、唐宋间的浮点绮等，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并丝织法织成的。绫是一种斜纹织物，以暗花绫最为常见。所谓暗花绫是指用同色经纬线织成的一种斜纹地上起斜纹花的丝织物，通过经纬组织枚数、斜向、浮面中的一个或多个要素的不同来显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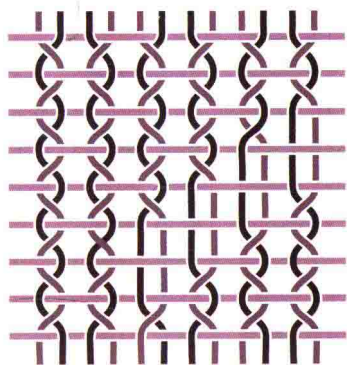
01 绮织物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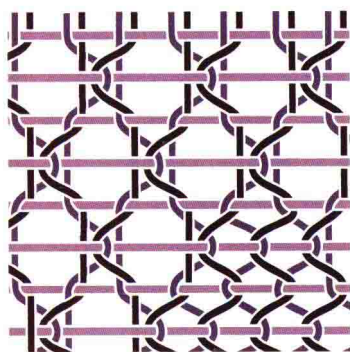
02 绫织物组织

纱与罗都是经纬线稀疏并织物上呈现小孔的丝织物。一般而言，凡经线起绞、纬线平行交织的织物均可称作纱罗织物，但一些稀疏的平纹组织往往也可被称为纱。纱出现得很早，周代已有以纱制作王后和命妇服饰的记载。纱的基本组织为由两根经丝相互绞转并每一纬绞转一次的二经绞组织，实物则以多种组织配合织造的暗花纱居多（图 03）。汉唐间纱罗织物的主要组织类型是链式罗，又称无固定绞组罗，其中又以四经绞罗最为常见。花罗是罗地上显现各种花纹图案的罗织物总称，通常以四经绞作地，以二经绞显花（图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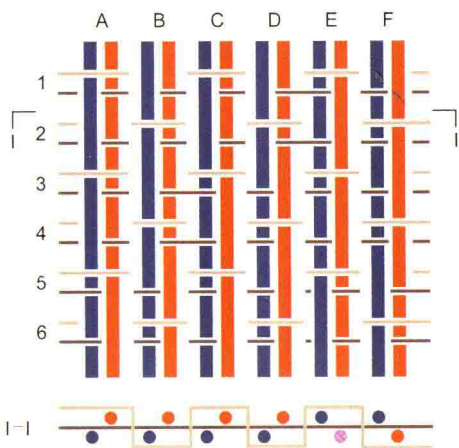
锦是一种重组织结构熟织物，丝线先染后织，通过织物结构的变化，呈现变化的色彩和图案。经锦包括平纹经锦和斜纹经锦两类，在中国古代平纹经锦出现最早，战国时期的墓葬已有出土，以经线显花，采用 1/1 平纹经重组织织造（图 05）。约在隋代前后，平纹经锦渐渐被斜纹经锦所取代。斜纹经锦多采用三枚斜纹经重组织（图 06）。纬锦包括平纹纬锦和斜纹纬锦。平纹纬锦指的是平纹纬二重织物（图 07），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最早的斜纹纬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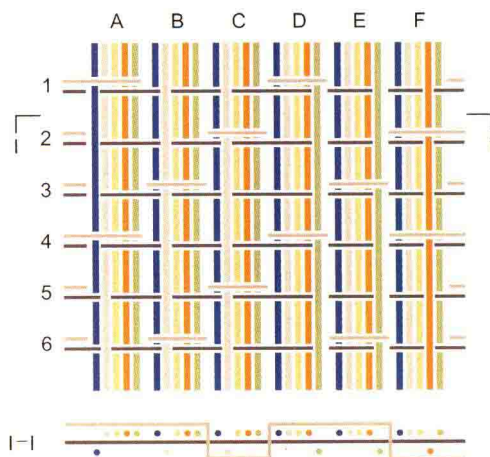
03 花纱织物组织



04 花罗织物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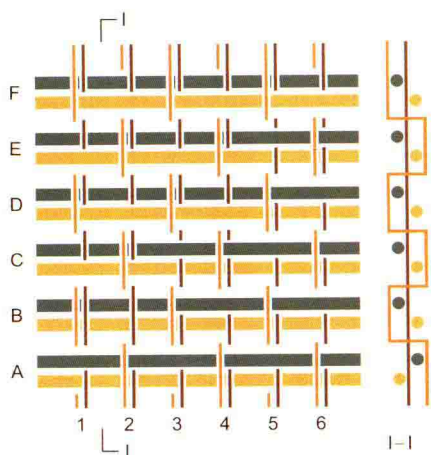


05 平纹经锦织物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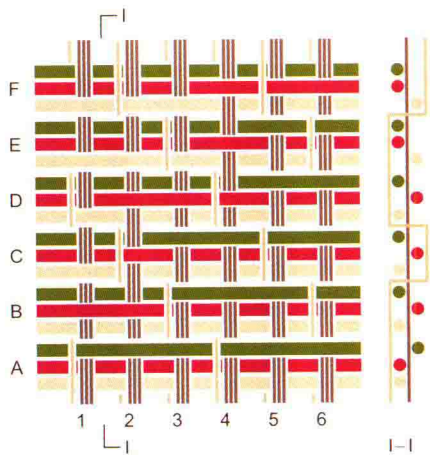


06 斜纹经锦织物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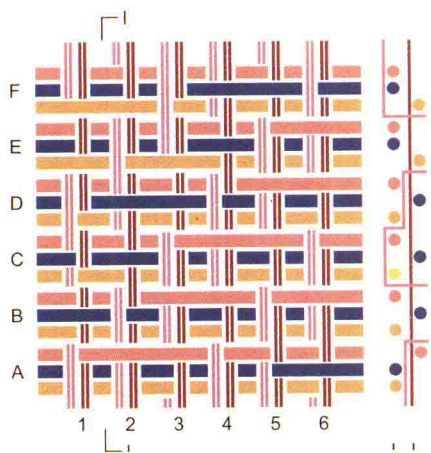
出现于唐代早期，到中晚唐时已基本取代了经锦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锦类织物。几乎所有的斜纹纬锦都是三斜纹锦，其基本组织都是斜纹纬二重，即由一组明经和一组夹经与纬线以斜纹规律进行交织。斜纹纬锦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的明经只在纬线的表面按斜纹交织规律进行固接，组织以 $1/2$ 斜纹纬重组织为主，织物正面为纬面组织，而反面为经面组织，我们称之为全明经型纬锦（图 08）；另一类的明经在一斜纹循环中只在织物表面和反面各出现一次，形成对纹纬的固结，而另一组织点处却插在表纬之下、底纬之上，与夹经的位置相同，织物两面均为纬面效果的 $1/2$ 斜纹纬重组织，我们称其为半明经型斜纹纬锦（图 09）。大约从晚唐开始，斜纹纬锦的基本组织结构和织造技术有了极大的变化，半明经型斜纹纬锦开始出现，由于此类实物大量出自辽代，也被称为辽式斜纹纬锦。双层锦在织造时使用两组经线和纬线，通过表里换层，形成正反图案相同但色彩相异的双层组织（图 10）。早在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就已出现使用双层组织进行斜编的丝织物，在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汉魏时期的毛织物上也发现有双层组织，但双层丝织品大量出现则是在唐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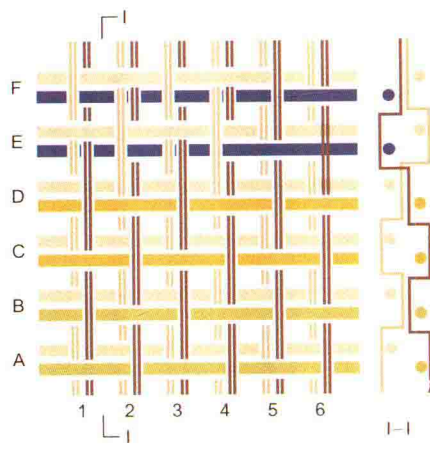
07 平纹纬锦织物组织



08 全明经型斜纹纬锦织物组织



09 半明经型斜纹纬锦织物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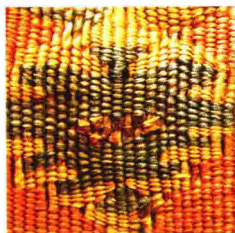


10 双层锦织物组织

缂丝是以不同色彩纬线在不同区域以通经回纬方式挖织产生图案的产品，因而织物上常因垂直的花纹轮廓而留下纬丝转向时的断痕。织造时，以平纹组织为基础，以本色丝作经，以彩色丝作纬，用小梭将各色纬线依图案以平纹组织缂织（图 11）。

刺绣是用针引线在织物上穿绕形成图案的一种装饰方法。中国刺绣的起源很早，不过，其最有特色的针法一直是锁针绣（图 12）。这种针法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可以看到。从商代包裹青铜器的丝绸印痕和西周时期丝绸荒帷在泥土上留下的印痕来看，当时采用的正是锁针绣。中国的刺绣在汉晋时期以锁针绣为主，是出土的汉晋丝绸刺绣实物的主流绣法。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绣品和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周的汉晋时期墓葬如尼雅、楼兰、营盘、山普拉等地出土的刺绣用的都是锁针。锁针用于制作大面积高密度的作品时过于费时费工，因此，一种表现效果与锁针基本一致但效率大大提高的针法——劈针出现了（图 13）。劈针属于接针的一种，在刺绣时后一针从前一针绣线的中间穿出再前

行，从外观上看起来与锁针十分相似；它和锁针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劈针的绣线直行而锁针的绣线呈线圈绕行，因此其技法比锁针要相对方便得多。唐代更常见的刺绣针法是平针，是一种运针平直，只依靠针与针之间的连接方式进行变化的刺绣技法。钉针是将单独的丝线或金属线钉于织物上而形成图案，平针和钉针结合出现了压金彩绣、簇金绣和盘金绣（图 14）。



11 缣丝



12 锁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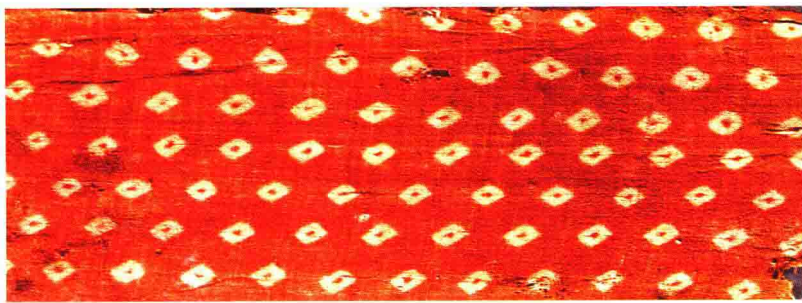


13 劈针



14 平针和钉针

汉代中国已经有了印花丝绸，之后又发展出了染缬工艺，主要包括绞缬、夹缬、蜡缬和灰缬（图 15、16、17、18）。绞缬即今日所谓的扎染，是指按照一定规律用缝、扎等方法绞结丝织物，染色后再解去缝线或扎线以得出花纹的一种防染印花工艺及其产品。敦煌马圈湾汉代遗址中曾出土过一件类似绞缬的丝织品，但用于服饰的绞缬实物在魏晋时期的墓葬才有较多的发现。夹缬是指一种防染印花的工艺及其产品。操作时，使用两块木制花版夹持织物而进行染色。夹缬之名始见于唐代，在唐宋时十分流行。蜡缬与灰缬的制作工艺相似，只是蜡缬使用蜡作为防染剂，而灰缬使用碱剂作为防染剂进行印花。由于唐代的碱剂以草木灰或石灰为主，所以唐代的碱剂印花往往被称为灰缬。灰缬以淀粉类物质掺以碱性物质作防染剂进行染色后，得到防染效果的图案。



15 绞缬



16 夹缬



17 蜡缬



18 灰缬

三、汉代丝绸的图案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的织绣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显花丝织物品种主要包括暗花罗、绮、平纹经锦以及以锁针绣为主的刺绣。汉代织锦既可以在同一区域内使用多色经线来变换色彩，也可以通过不同色彩的经线分区排列来呈现多色，用色至多可达五色。汉代织锦常为五色，这应与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相关。《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绘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五彩备谓之绣。”故当时标准的五色或五彩是白、黑、青、红、黄，它们与五行中的金、水、木、火、土或五方中的西、北、东、南、中分别对应。汉代织锦中的五色显然也与此有关，但当时织锦五色一般都采用蓝、红、黄、绿、白五种，分别以蓝取代黑，以绿取代青。

（一）云纹

汉代的云纹主要出现在刺绣和织锦上，刺绣上以单纯的云纹为多，其中以马王堆出土的刺绣最为著名。根据随葬遣策上的记载，马王堆的云纹刺绣为三种，分别为长寿绣、信期绣和乘云绣。这三种云纹比较类似，云头部圆润，尾部分叉呈腾飞状。

织锦上多采用云气、动物甚至是汉字组合而成的云气动物纹，是汉代织锦中最具特色的主题图案之一，当时也被称作云虞纹。^[1] 此类锦在新疆的楼兰和尼雅地区发现最多，其色彩、造型和排列方式都很相似：云纹一般是作为图案的骨架，其间穿插有龙、虎、麒麟等瑞兽和禽鸟。当时的云气造型主要有四种：一是穗状云，云带断裂，带有花穗状

[1]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80。